

性作用,相互支持、互为补充,政治制度建设的规律也会显露出来。《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中就有这样一条,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的答复可以举行公开听证,通过答询、辩论、评议、合议等方式,查明事实,解决问题。显然,这就发挥了制度的结构性作用,把制度配套起来,加倍地发挥制度效应。以此类推,信访制度也可以与巡访制度结合起来,可以进行针对性的巡访。信访事项中如有重大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问题,可以通过巡访制度进行调查问责。如果事实确凿,就应进入制度运转程序;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应该还当事人以清白。这样,巡访制度也可以发挥积极保护正当权益的功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功能要在运转中才能逐步显示出来,这要靠人去认识它、挖掘它,这也是人与制度的一种关系。西方有位学者曾经说过,“制度是活的东西,是不轻易将它的秘密透露给刻板的文字的。”^[3]只有让制度运转起来,人们才能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地触及政治运动的规律,在促进政治知识增长的过程中使政治发展的道路变得豁然开朗。

钱穆先生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探讨了“制度生长”、“现实环境”与“理论”的关系,他认为:“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必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4]这一见解,颇有启发。制度背后还有制度精神,还有政治知识的累积,因此,让制度运转起来需要有政治知识化为支撑。同时,让制度运转起来又是推进政治知识化的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1] 古丁 罗,克林格曼 汉. 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03.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拉斯基 哈. 美国总统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
[4]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8. [责任编辑:冯昱锦]

政治知识化的核心议题:建构政治与知识的和谐关系

郭 剑 鸣

(浙江财经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理性化的政治发展是建立在政治知识化基础之上的。要顺利地推进政治化,首先要消除政治与知识通约的障碍,也就是建构政治与知识之间的和谐关系及其机制。建立和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重点是将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起来。

政治发展需要以政治知识化为基础,因为政治本体就是知识,正如欧克肖特指出,“政治要求知识”,“每当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求那种知识”^[1]³⁸。但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政治的知识化是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政治知识化是政治哲学化、政治科学化和政治社会化的有机统一,这需要对政治进行全面的哲学检视,形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观念,并通过科学的机制建构和谐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

一、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式思考

“知识即美德”、“哲学王”等称谓无疑是对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式思考的范例。将政治与知识关系提到命题的高度来认识,可以使政治与知识关系的问题更加严肃,有利于在这个问题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沉淀出一系列经得起历史推敲的结论,从而使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政治知识化的认识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正是造就科学政治生活的思想基石。

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命题的内涵是思考政治生活的知识基础问题。首先,它要回答政治道理依靠什么来说明和解释?政治现象主要依靠经验来解释?还是依靠知识来解释?进一步,是依靠神秘知识、神学知识,还是科学知识来解释?这个问

收稿日期:2007-09-26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06JDXM81001)资助
作者简介:郭剑鸣(1967-),男,江西吉水人,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

题不弄清楚,政治生活就难免被神秘化、经验化和臆断化。在历史和现实中,把政治视为“禁区”,所谓什么人“不懂政治”之类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灌输。这实际上是肢解了政治与知识的密切关联性的结果。荀子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这里的“物之理”、“人之性”正是知识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特征。政治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政治与知识关系命题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政治具有公共性的基本特征。其次,它要回答政治制度是依靠什么来建构和支撑的?政治制度是政治管理的基本规范和工具,它有三个重要来源:一是历史经验;二是现实试验;三是逻辑推导。逻辑推导无疑是一种知识运动,而历史经验和现实试验也需要通过归纳、总结转化为知识单元,才可能沉淀为规范。否则,它不便于广泛传播、被人理解,难以社会化。而社会化是政治制度的生命线。政治制度只有通过知识化,向执政者和相对方输出具有共识性的政治理念、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规范,才能被社会普遍遵守,发挥效力。同时,政治制度如果离开了知识单元的推敲和考究,其科学性也难以保证。所以,知识是建构和支撑政治制度的基本元素。再次,它要回答科学政治行为的主体力量是如何成长的?这里先要区分革命政治与革命后政治、非常态政治与常态政治、斗争政治与建设政治的问题。一般来说,在革命政治、非常态政治和斗争政治的环境里,政治行为的变动空间大,而受普遍政治规律的约束程度则收窄。也就是说,在此境遇下的政治生活对经验的依赖性大,政治行为主体主要是在各种血与火的政治运动中历练成长的。这种政治虽然也有对知识的需求,但知识主要发挥技术性功能,并不能成为政治决策锦囊的主料。但是革命政治、非常态政治和斗争政治都不是政治的目的和终极形式,相反,它们只是政治生活中的过客。革命政治终究要向革命后政治过渡,非常态政治、斗争政治也要向常态政治、建设政治过渡。在后三种政治形态里,政治生活具有鲜明的理性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世俗化特征。学理、规律、技术、规则、模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主流的,知识对政治生活的贡献日益凸显出来。政治行为主体的成长模式不主要依靠经验的历练,而主要依靠知识的训练。为此,欧克肖特在反思“理性霸权”的同时,对经验主义政治风格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他说,那种经验主义政治风格是“一条通向荒谬的进路”,是“鼓励无思想的人”去参与政治,“做内在不可能的事”,会有“不幸的结果”^{[1]40}。

要推进对政治问题的命题式思考,最为关键

的是整个社会在思想认识上要把政治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来对待,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的示范。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实践的哲学,是一门在行动领域驾驭全局的知识体系。政治的严谨性在于其作为分配公共利益的权威角色,在公共利益的分配中,来不得半点非理性。而理性恰恰来源于对问题的哲学式思考。对政治问题的冷静思索比对经济问题的冷静思索更迫切,因为政治生活是最高的公共领域,这里涉及你我他的利益,涉及公理、正义的存废,政治行为不当所造成的损失需要由广大公众来承担。而经济生活是私人领域,经济行为的不当只会祸及行为人和有限的对象,其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也主要由当事人承担。所以,在经济等私人领域所能包容的试验性行为、有瑕疵的行为要比政治领域大得多。所谓“谋定而行”在公共领域自然要比私人领域更有迫切性。那些愿意为政治的公正性付出,去“谋定而行”的人更难能可贵。

于是,就提出了推进对政治问题的命题式思考的第二个关键,即执政主体的哲学化和知识化建设。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执政主体就是政党,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尽管各国的政党政治不拘模式,但一个成熟的执政党对政治基本目标和任务的认识应该是一贯的,这并不排除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形势和需要,会调整他们的工作重点。一个政党要做到在工作重点的调整中不改变其对政治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坚守,或者说,将目标的终极性与时代性贯穿于原则性与灵活性之中,就必须使自己高度地知识化和哲学化。一个缺失知识化和哲学化的政党,也许会在一些具体问题或短期目标上显示出活力,但由于其缺乏对政治本意的恪守,人们往往看不出其执政的神韵。这样的政党为求一票,可以隔三差五地变换政治纲领。表面看,他们在不断地解决问题、满足选民的要求,但实际上新生的问题却比老问题解决之前还多。

第三个关键是形成对政治生活思考的学术环境。特别是审慎处理好政治主张与学术主张的关系。韦伯是现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重要立言人,如同他在建立官僚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中立思想一样,在处理知识、学术与政治关系时也贯彻了同样的准则。韦伯认为学术和政治是并立的,学术和政治均可成为独立的志业,它们有自己的逻辑和结构。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他对政治所开展的学术分析是两回事^{[2]176}。知识与政治的恰当关系需要双方的相互尊重。学术与政治的追求,学者与政治家的角色只有部分的重合。学者重在知性上的建设,而政治家则在情感、

价值理想上有着特殊的要求。在许多方面学术并不能满足政治的诉求。但政治家的情感和价值理想要付诸行动必须受学术的影响,政治生活需要接受学术标准的考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政治均出于学术的安排。学术之目的不是颠覆政治的权威,而是审视政治支配权的合法性。“学术的任务包括传播责任伦理的心态,唯有当公民以及特别是政治家接受了这种心态,学术方足以真正实现它对于政治可能提供的功能。”当然,政治也不要指望学术成为其附庸,或借科学来“宣传政治、伦理、美学、文化或其他信仰”。学术必须有制度性的自主,独立于政治之外,方能为政治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2] 136-146}。学术主张越要接近真理,充分的学术论争和碰撞就越不是不可或缺,而只有建基于接近真理的学术主张之上的政治主张才能更经得起推敲。所以,学术主张的个性化不仅不是政治纷争的温床,反而是生长稳定的政治主张的土壤。

二、政治与知识关系的科学性

要使政治与知识的关系和谐化,必须把它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瑟夫·劳斯说:“知识表达了在各种环境中世界的某些方面如何对其他方面有教益。权力表达了行动者的活动如何影响他们自己以及其他后继的可能行动的形态。”^{[3]序言}根据约瑟夫的研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关系是运用知识获取权力。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如果一个人能精确地再现其情景及其工具所产生的效果,那么他就能更轻易地获得或更有效地使用某种权力。知道事物是什么样子的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就能够为操纵和控制创造机会;如果不知道的话,就会误导或阻碍对事物的介入。第二种关系是在权力被用来阻碍或扭曲知识的获取时出现的。虚假的信念被强加于人,或者你所得到的都是些无根无据的东西,而正确的信念则受到压抑。有时我们能分辨出第三种关系,即知识可以把我们从权力的压制作用下解放出来。它能够揭露权力所造成的扭曲,揭开权力进行黑箱操作的面纱。解放既可以被还原为知识的另一种“运用”;也可以只看做权力扭曲知识的另一种表现;或者还可以看做不能被还原为另外两种关系的一种独特的关系^{[3] 12}。可见,在两者的关系中,知识对政治的支撑性是主要方面,政治对知识的运用需要有科学的机制和正确的方向为保障。但是在社会实践中,政治对知识发展的制约性反而是突出的,似乎是知识离不开政治,而不是政治离不开知识。似乎知识离开了政治更可怕,而不是政治离开了知

识应引起社会的担忧。为确保政治和权力对社会的影响朝好的方面、理性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发展,需要科学地把握政治与知识的关系。

第一,政治与知识的相互独立性与相互依存性是并存的。虽然政治脱离知识仍不失为政治,而知识脱离政治仍可谓知识,但无论从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来看,两者的联系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政治没有知识的支持,它既不能准确地明辨目标,也不能选择合理有效的实现目标的手段。政治生活鼓捣不出救世良方,它的价值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知识的本体意义也需要在向社会输出中体现出来。知识脱离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这些活生生的场面,不仅知识自身的演进会失去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局限在形而上的范畴中,知识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无从展示。如果是那样,探求知识的群体就会萎缩,知识也将被边缘化而极大地限制其价值和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郑重指出:知识的唯一合法目标不是为科学而追求科学,只能是“给人类生活提供新的发现和力量”。^①因此,要建立科学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先要把两者紧密地连接起来。知识是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政治也是一个可以为知识的繁衍提供丰富养分的领域,政治权力不能外在于科学知识,政治权力本身应成为拥有知识的一个标志。

第二,知识与权威组合是可靠而稳固的组合。因为科学政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健康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技术方法无不是知识进步的结晶。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权威可以提升权威主体的素质,改善权威的结构,充分发挥权威的效能。同时,知识对政治的健康运作还能起到规训和监督作用。知识殿堂的学理性、严谨性和公共性是其产生规训和监督能力的基础,也是衍生政治真理、政治科学和政治公正的基本元素。产生于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政治权力不为特定的行动者拥有,也不为特定的利益服务。正如福柯所说,这样的权力“决不会停留在这儿或那儿,决不掌握在任何人手中,绝不是可以挪用的商品和财富”^[4]。这样的政治生活才可能成为科学、健康和公正的政治生活。另外,通过知识获取的政治权威也容易得到认可,不会轻易被替代,因而更为可靠、稳定。综观历史上政治权威的产生路径不外乎三条:暴力——政治权威,财富——政治权威,知识——政治权威。在这三条与政治权威通约的道路中,暴力取得权威最容易,其更换也最频繁,此所谓“改朝换代”式的权威之路。财富

① 培根《学术的进展》,转引自苏宁《启蒙人格——培根》,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209-210 页。

取得权威最易使政治失去其自身的价值,也最容易被操纵。近代市民社会兴起以来,政治权力的分配就主要走的是财富趋向模式,以至于国家越来越失去自我,不得不寻求在获取经济成长的贡献中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5]。只有知识权威是相对恒久的,也最有合法性基础。这不仅是指知识权威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间断的驳辩过程,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循环往复,每一个知识权威的确立都意味着人类对真理的接近,而且,由于知识的公共性和循环的验证性特征,它不容易被垄断。企图通过操纵、收买等方式获取知识权威往往是行不通的,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将军可能通过一次政变取得执政权;一个商人也可能通过倒卖批文预先获得内部消息而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成为政府的“座上宾”;但一个学者要想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奠定其知识的权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知识进步的内在机制中自有其规训的力量。中西方历史上基于知识、科学和思想的丰碑而树立的权威,如孔子、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其影响都是超越时代的。所以,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人们获取政治权威,而且是通往政治权威的最可靠、最理性的方式。这对于以推进现代化建设为最大的政治任务的后革命时代,尤其如此。

第三,客观、全面地看待政治对知识发展的影响。在知识领域,自有其生长的逻辑、机制和范式,但唯独发现问题的动力是外在的。政治生活是公共问题成堆的地方,政治与知识的组合大大地打开了知识拓展的空间。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公民间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无不需要知识的介入,也为知识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主题。在知识论史上,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本体是中性、中立的,它不涉及倾向和价值判断的说法是一贯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知识属于实然范畴,而非应然范畴。但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本体的认识却是曲折的,先后经历了传统哲学研究方法—行为主义方法—后行为主义方法的反复。其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主义方法兴盛之时,科学和知识的发展几乎都沿着“纯科学”、“纯知识”的路子,一度出现了知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两张皮的发展态势。但是科学、知识与社会问题的脱节终究不能持久,随之爆发的街头社会运动便对科学和知识发出了关注经济公平、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呼吁。后行为主义革命将行为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定位矫正了过来,重新把知识与政治链接上。政治和知识的关系类似于“出题”和“破题”。当

然,政治面只是众多为知识面出题者之一,而知识面则是为政治面破解难题最可靠、最基本的因素。倘若政治面给知识面的影响超出了“出题”的范围而深入到解题的过程,政治作用于知识的正当性就将丧失。同时,政治面也可能给知识面捏造出许多伪命题,这时政治也不会对知识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在不健康的制度环境下,政治面捏造假命题的现象是常见的。所以,如何规避政治对知识发展的过分干预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在科学的政治与知识关系中,政治为知识“搭台”,知识替政治“唱戏”的现象或许难免,但知识不能为政治收买。知识运动的独特规律决定了知识发展的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政治对知识的获取过程既可能提供便利条件,也可能起压制作用,这取决于政治运动的需要。但政治运动的规律不总是与知识运动的规律吻合。政治可以影响人们如何获取知识、形成信念,但不能保证这种知识和信念的真理性。一句话,知识可以获取政治权力,改善政治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政治权力对知识的进步具有推进和阻碍“双刃剑”式的作用,但它无法创造新知识^{[3] 16}。

三、政治与知识关系的机制

政治与知识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处理起来却又复杂。要使两者的关系保持在和谐、科学的轨道上运行,没有一定的机制不行。建立和谐、科学的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重点是如何将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和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主要包括丰富的知识积累、不阿权贵的学术批评氛围、不断接近真理的精神、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多元的信息管道和证伪手段。常态下的政治领域以公平、民主、平等、共富、秩序等为价值追求。一个良好的知识与政治关系机制就是要既充分发挥知识领域的创新资源为政治领域的价值追求服务,又规避政治权威对知识领域创新力的破坏或收买。

知识面要做到最有效地服务于政治面的价值追求,关键是保持知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独立并非对立,知识领域的运作越是独立,就越容易发现问题、接近真理,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找到理想的出路。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面对知识面的相对独立发展缺乏信心,知识面在政治面预设好的“床头下放风筝”,不仅放不高,久而久之,便不会放了。知识界的同人们也许都见惯了,现在召开学术会议,往往都要请政府官员来坐镇。来的官员无论年轻年长总是居中落座,也无论有无研究总要发一通指示,而且与会官员职务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会议重要与否的标志。似乎离开了

行政介入,知识界连学术会议都不知道开了。这也许还只是问题的表象,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们对这样的现象麻木了,政治面和知识面都沿以为例。长此以往,知识面就会失去对社会危机的嗅觉,更发挥不了对政治面的警示和规训功能。

知识面探索什么、形成什么结论应该与政治采取什么行动区分开来。知识面可以就政治面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也可以根据其自身的材料和逻辑形成各种各样的结论,但政府是否选择这些结论或建议是政府的自由。一个根据科学规律下结论,一个根据公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选择,求同存异。这样,政治面就没有必要害怕知识面有“踩线”之嫌,知识面也没有必要受仰政府鼻息之累。知识面的意见并不必然要转化为政治行动,因为两者各有其运作的规则。比如,从知识面看,我国早就掌握了发展航母的技术,但政治面考虑的是发展与不发展航母、何时发展航母对国计民生更为有利。所以,我国发展航母的计划至今仍未明晰出炉。

知识面应该加强自律,忠实其使命和职责,避免知识面完全官学化。在处理知识与政治的关系上形成一定的沟通机制和管道是必要的,也可以有一批官学两栖的官员和学者。政府中要有通学术、熟悉学术规则,与学术界广交朋友的学者型官员;学术界也要有通政治、熟悉政治规则,与政治面广交朋友的官员式学者。这样对政治与知识的互通是有益的,但是,学者型官员可以多,官员型学者却不能成群成风。因为,学者型官员可以借助其丰富的知识储备更好地执政,而官员型学者却不能借助其政治地位真正做好学问。现实的情况是,学者型官员不够多,而想与官方搭上关系的

学者却很有市场。这说明在知识与政治的关系机制上,政治面介入知识面的程度比知识面影响政治面的程度深得多。在这样的体制下,知识面会越来越浮躁,安心耕“责任田”的人少了,谋一官半职的人多了,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不滑坡才怪呢。比如在高校,以往需要作深度的动员才能请出教授来做行政,当校长、系主任,现在想谋位的人多了,不得不搞竞聘。在学术界里也滋长了论官排位的官僚风气,诸如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评估专家委员会。如果你只有学术头衔而没有行政职务是很难成为其中一员的,即便你侥幸挤进去了,话语权也是掌握在带长字号的专家手中。这并非因为你的学问不如他,而是因为你没有官员身份。在知识大殿里,不以知识学问的深厚为尊,而以行政职务的高低为荣,是知识政治化的苦果,而非政治知识化的琼浆。我们需要推动的是政治的知识化,而非知识的政治化。这应该成为处理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 欧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2] 韦伯. 学术与政治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 劳斯 约. 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4] FOUCAULT M. Power/Knowledge [M]. New York: Pantheon 1980 98

[5] 孙关宏, 胡雨春, 任军锋. 政治学概论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03.

〔责任编辑:冯昱锦〕

市民社会的成长是政治知识化的社会基础

何 历 宇

(浙江财经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以政治理性化为核心的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民主权观念是政治知识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而孵化人民主权观念并使其得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则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

政治知识化,指的是现代政治的知识建构性

与知识积累性,其核心是政治理性化。政治知识化最深刻的原因源于整个现代性之中。现代社会形态替代传统社会形态,以及近代科学改变人类知识形态为现代政治知识化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及其社会基础,这一基础的载体就是市民社会。

收稿日期: 2007- 09- 26

作者简介: 何历宇 (1971-), 男 (苗族), 贵州思南人, 副教授, 法学博士, 从事政治学与公共伦理研究。

牟发松

1954年生，湖北江陵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82—1988年师从唐长孺教授攻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先后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破格晋升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海外研究基金多项。曾专职协助唐长孺教授撰写其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独著《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等；主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独立发表学术论文50篇，被海内外报刊全文转载13篇。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2008年第1期）。



吕铁

1962年生，辽宁盘锦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工业经济、运输经济。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以及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科技部、交通部等部委和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省（市）委托课题数十项，围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工业化水平评价、制造业发展战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工业技术创新、铁路运输生产效率测算、高速公路管理体制体制改革等问题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百篇。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论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转换》（2000年第1期）、《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结构变动特征》（2004年第2期）、《缓解资源约束、促进产业发展》（2004年第6期）、《新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问题探索》（2005年第6期）、《对工业结构变化及重化工业化现象的分析与思考》（2007年第5期）。



郭剑鸣

1967年生，江西吉安人，法学博士，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任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汕头大学地方政府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发展与公共管理改革问题研究。在《学术月刊》、《人文杂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10篇次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独立完成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项，主持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成果先后荣获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论文二等奖。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政治知识化：建立科学执政模式的基本进路》（2007年第4期）、《政治知识化的核心议题：建构政治与知识的和谐关系》（2008年第1期）。

